



历史研究方法（一）

吴焯 主编

目 录

历史研究基础工作	1
基础工作介绍	1
基础知识	9
辅助科学工作	31
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历史	41
左倾思潮给历史研究带来的危害	42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47
研究方法上现存的问题	53
史料的价值及使用	93
史料的分类	95
史料的价值	99
史料的搜集	106
史料的鉴别	108
辨伪的发展	114
辨伪的方法	119
史料的解释	128
史料的使用	131
“考证”的辨析	137
考证工作步骤	139
如何进行考证工作	142

历史研究基础工作

基础工作介绍

搞历史研究从哪儿下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常常被初学者提出来的问题。我个人的想法，初学搞历史研究，首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说要打好基础。中国历史这样长，面这样广，史料浩如烟海，全面研究不可能，只能就一个时期，或一个专题作些研究。但不管搞哪一段，搞什么题目，充分的准备工作非做不可。准备工作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理论问题。也就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这些，一般都学过了一些，但学了不一定能掌握，更不等于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好地和历史事实结合起来。我们搞历史研究就是要把马列主义理论和历史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对过去的历史有正确的认识。解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存在的问题还很多。

理论问题是历史工作者或教师首先要遇到的问题。好多人有这样的想法：既然我们有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甚至对某些具体问题马列主义也有具体的结论，那么我们搞历史研究，是不是就可以从这些理论、原则出发？有不少人就是从理论、原则出发的，结果，历史研究变成在具体的历史问题上找一些材料来证明马克思主

义的某些原理或某些具体结论的正确性。这样做是错误的，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也强调：我们必须“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则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研究方法，适应于一切科学研究，我们搞历史研究的人，绝对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搞历史研究，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最高原则。我对这句话的体会是它包括三个“实”字：一，从事实出发。你要想研究一个题目，必须先去找材料，看看当时的历史是个什么情况；决不能先有一个固定的想法，然后找材料证明你的想法。这样做就颠倒了认识的顺序。二，实事求是的态度。事实是怎样就是怎样，不能歪曲。我们经常发现，有些人对历史事实作了无意或有意的歪曲。有歪曲理论的，有歪曲材料的。“四人帮”自不必说，在“四人帮”之前和之后也有人犯这样的毛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不惜歪曲理论，歪曲材料，这就不是科学研究，是研究历史的大忌。三，研究结果正确与否，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历史是过去的事，怎么检验呢？那就是看你能不能用你的结论正确地解释和说明历史问题，为大家所接受。这是我们在开始搞历史研究时首先要碰到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开始作研究工作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理论必须有正确认识。

关于如何学好马克思主义，如何把理论与史实正确地结合起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具体的历史问题，在后面里有较详细的阐述。这里我想特别提出一点，希望初学者注意的，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的基本原则，而不是对某些具体历史问题，马列主义大师们的具体看法。前者是客观存在的真理，应当信守不渝；后者则受时间、地点、具体条件的局限，不可能做到永远正确，也要具体分析，不能奉为金科玉律。我们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看成神，他们不是无所不知的，更不是能先知的。他们会受时代的局限，条件的局限，作出不很妥当甚至错误的结论。他们并不否认他们是会犯错误的，有的他们自己改正了，有的他们来不及发现并加以改正。比如本世纪中所发生的新事物、新情况，是他们看不到的，也不可能预料到的，他们不可能来改正，这就需要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来替他们改正，否则我们就会变成教条主义者。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初学者能达到这个水平，但是我们应当知道，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样我们就不会把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看成一成不变的，永远正确的东西。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是在不断改进之中。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当然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

第二点是古汉语即文言文方面的准备。凡学习我国历史（包括古典文学）的必须通过古文关，这是不用说的。问题是现今一般大学生的古汉语水平不够高。虽然一般在一年级时学过历史文选，但是学的很不够，对古汉语的语法、句法的知识也不够，读起古书来感到非常

困难。克服困难的办法是要多读，读熟，同时学习古汉语的语法。古汉语水平的提高不是一两年的工夫能行的，一定要年年学，坚持下去。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还要注意文字训诂，读一些在训诂学方面的专著，这样提高就会加快了。

一般说来，越古的文章就越难懂，搞先秦的历史，比搞秦以后的历史，古文的根底要深一些。不过搞近代史，也同样要有好的古文基础，因为近代人作的文章也大部分是用文言的，白话的材料很少。有少数人，比如章太炎的文章是很难懂的，因为他喜欢用古字、古语，用典故很多。又如严复译西方资产阶级的书也是用文言，而且译得古色古香，古文程度差的人读起来是很吃力的。所以我们说，古汉语的学习要不断坚持下去。

读古书要注意虚字的用法，还要注意一字多义，否则就很容易理解错误，或者看不懂。古书不好读，问题常出在虚字上，虚字不能解作实字。下面介绍几本关于这方面的书作参考：

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王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他这书所说的“词”，主要是指虚字。虚字有很多用法，王引之从经传中把它们收集起来，分门别类编在一起。这部书是很有用的。1956年中华书局印的铅印本，除了王的原文之外，还收了其他人的补充和辨驳。吴昌莹的《经词衍释》，就是补充解释王书的，中华书局也印了。杨树达的《词铨》，“铨”是解释的意思。本书的特点是用文法解释虚词的。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性质相同，这本书的特点是举例特详。

看了这些书之后，你就会知道一个字有各种各样的用法，随便举几个例子：

“若”，一般作“象”或“假如”解。但《史记·项羽本纪》：“吾翁即若翁”当“你”讲；《尚书·尧典》“钦若昊天”当“顺”讲。还有其他讲法。

“乃”，一般作“是”、“于是”讲，但古书中有很多其他讲法，如《尚书·盘庚》：“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当“你的”讲；《诗·郑风·山有扶苏》：“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当“可是”讲。

这些在古书中经常见而现在见不到的用法，我们看看书中的例句就知道了。上面这些书不是都要去看，有一二部就基本够了。

再有，读古书有时会碰到这种情况：一些句子的用法比较特殊，这是句法问题。有一本书可以看，就是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俞是章太炎的老师。这本书找了好多例子，归纳了古书中各种不同句法，对我们了解古书很有用，解放后中华书局重印过，并收进了杨树达、马叙伦等做的补充，书名叫《古书疑义举例五种》。

过去的古书没有点句，当然更谈不上标点。现在出的古书，一般都做了标点，看起来当然方便多了。但是有的标点也不大靠得住，因为这关系到不同人的不同理解。杨树达有一本小书，叫《古书句读释例》，应该一看。“句”是一句话，用“。”表示；“读”（音豆）是不够一句话，但在读时要停一下，用“、”表示。这种办法在明朝刻书时就有了。念书首先要能够点句。点句如果不对，就说明你对这句话不懂。举个例子：有一年我招考研究生，选了一段《史记》里的《李斯谏逐客书》，要求先标点后翻译。其中有这样两句话：“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不止一个人把句断在“河”的后面，结果成了“泰山不让土

壤，故能成其大河”，完全不通了。这说明他们根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不会断句，这怎么能看古书呢？

以上所举各书，都可以作为工具参考书。当然不是说这些书中所讲的都百分之百地正确，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有点错也不要紧，我们看书多了，慢慢会辨别纠正的。

由于古书一字多义，更由于古义往往被后人弃而不用，读古书，特别是先秦的书，就困难了。这就要求我们学习训诂，就是古书中字义的解释。我们不是专搞文字训诂的，不必从文字学学起，但是为了读懂古书，不能不懂得一些训诂的知识。怎么学习呢？一个办法是用《说文》、《尔雅》一类的书作参考，当字典用。第二个办法是多读古书，要认真地看，不要随随便便地看。比如十三经或前四史，都有前人的注解。这些书有注、还有疏。注是对原文的注解，如某字怎么讲，某字读什么音。这种注都比较早，多半是汉人或魏晋人做的。疏是给注做的注，大多是隋唐人做的。现在我们见到的十三经的疏，主要是唐初人总结前代各家的注解编的。注一般比较简单，而疏则很详细。如《左传》孔颖达的疏就做得很详细，有时还引有前代其他人的注，把不同的解释都列在书里。由此可知，看古书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难，这是因为凡是重要的书，前人都做了注解，当然，这些注解不能说就没有问题，因为它要受时代、学派、材料等等因素的限制，所以注得不一定都对；但一般来讲，对我们看古书是大有帮助的。宋朝人对汉儒的注解不满意，有人就又做了新的解释。比如朱熹，对《诗经》做过《诗集传》，对《易经》做过《周易本义》。他的学生蔡沈对《尚书》做过《书集传》。这些书都对前人的观

点提出了不同的新看法。到了清朝，汉学复兴，清儒不满意宋儒的解释，他们又新做了一套注疏。这些新的注疏主要是根据汉儒的旧注，做新的解释。“十三经”里面大部分都有清朝人做的新疏。这些书的名字很多，看看《书目答问》就知道了。梁启超做过一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中有几章，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收在《饮冰室合集·专集》里，这本书对清代学者重新注解的书籍有很详细的介绍，也很值得看一看。

清人在训诂学方面最好的书是王引之的《经义述闻》，是读十三经必读的书。王氏此书用比较、归纳的方法，往往能改正前人的错误，提出自己的新解，而且有根有据，不逞臆想。我们从该书中可以学得许多训诂学上的知识，并且会得到有益的启发。

关于训诂，我还要特别提出一部书，就是清代阮元编的《经籍纂诂》。纂是编在一起，诂是解释；他把对古书的各种不同解释都编在一起，查检很方便。这本书过去有很多版本，最近又有重印本。

以上所说关于古汉语方面的知识似乎太多了，但它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却是必要的，尤其是对有志于研究先秦史的人，更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点是思维方法的训练。任何研究工作都是脑力劳动，因而一刻也离不开思维。思维是有规律的，合于规律才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因此，科学研究工作的思维必须合于科学思维规律，否则就会成为胡思乱想。

这道理本来是容易懂的，但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搞历史研究更是如此。我看过一些文章，提出一些新奇的說法，仔细一看，原来是不按逻辑规律得出的，连形

式逻辑的规律都违背了。有的甚至于偷换概念，在论辩时先把对方的论点歪曲了再加以反驳，实际上不是张冠李戴，就是文不对题，再不然就是歪曲事实，甚至连马列主义的理论也歪曲了，企图用这种方法来论证他的论点的正确性。只要你看穿了他的文章是违犯了逻辑规律的，它的错误立即就会被揭穿。因此我说，搞历史研究必须懂得形式逻辑。这还不够，还要懂得辩证逻辑。有些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往往用形而上学的眼光，而不是用辩证法去看问题。这根本上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形而上学的看法？就是把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看成一成不变的，或变动很少的。把理论也看成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用一句话说，就是“通之古今而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成这样的绝对真理，这点连马克思、恩格斯自己都不承认。他们往往把许多复杂的历史现象看成是彼此孤立的或没有多大联系的。更多的是对历史事件或人物不能一分为二地看，不能全面地看；或把历史人物看成没有思想矛盾或始终一贯的，或评价历史人物，如果他晚节不终，对这人便彻底否定，不管以前有多大的功绩也都一笔抹杀。他们把一切事物都看成绝对的，不是绝对的好就是绝对的坏。他们往往以今论古，不考虑一切历史都在不断变化之中，而是把今天的情况认为古来就是如此。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总之都是形而上学。辩证法则与此相反，它要求把一切事物都看成在不断变化之中，不能绝对化的，一切事物不仅有矛盾而且会转化。研究问题要看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不能用一个框框去套。马克思主义既是一门科学，当然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如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僵死的教条，那就根本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总之，对初学来说，好好学习辩证法，能善于运用辩证法是最要紧的，在这方面好好学习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和《邓小平文选》，我相信是会大有好处的。

基础知识

关于历史研究的准备工作，除了理论和古文之外，还要做些其他准备，对于目录、校勘、年代、地理、职官、史讳等，都应掌握一定的知识，有比较基本的了解。这些问题，本书不可能详细叙述，这要参看专书。我们在这里只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它们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目录学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当代史学大师陈援庵先生、顾颉刚先生也说过，他们治史都是从目录学入手的。为什么前人如此注重目录学？因为要研究历史，必须先要知道，前人有哪些历史著作或文章，哪些是必读的，哪些是一般参考的；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书有什么不同的版本，哪些版本是最好的，如此等等，这样你才能开始读书。一般读史是这样，读专史、搞研究工作，更要这样。

目录学的书，过去初学常用的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此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详列书名、卷数、作者和版本等，翻检颇易。解放前范希曾作《书目答问补正》，补收了一些原书未收和后出的书或版本，条理清楚，初学者按图索骥，便可得读书门径。该书解放后有中华书局新印本。史学论文方面的目录，可参看中国社

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史学论文索引》，以及新出版的《中国历史年鉴》。

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著作，是东汉班固根据西汉刘歆《七略》撰成的《汉书·艺文志》。《七略》北宋时已亡佚，因此《汉书·艺文志》就成了我们今天识别先秦古书与学派源流的必读书。《汉书·艺文志》把古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类，但没有史学一类，史籍被分散在有关的类目中，如《太史公书》（即《史记》）、《楚汉春秋》、《汉著记》、《汉大年纪》被列在六艺略的《春秋》类，《高祖传》、《孝文传》入于诸子略的儒家类。这种“经史同科”（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的现象，说明当时史籍还只是经书的分支。魏晋以后，史籍增多，逐渐出现了四部分类法。唐代魏征主持编纂《隋书·经籍志》，正式定名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直到清乾隆时编《四库全书》仍按这四部分类，故名曰“四库”。《四库全书》编纂时，编者于每一书，对其作者、卷数、版本以及书之源流及优缺点都作了概括的说明，放在每书之首；又汇集全部提要为单行本，名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部大型的目录学著作，对于我们了解十八世纪以前的典籍，极有参考价值。近人余嘉锡先生作《四库提要辨证》，订正《提要》的讹误，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校勘学校勘是根据古籍不同版本，比较文字异同，纠正错讹，恢复古籍本来面目，和版本、目录学有密切联系。我国古代的校勘学，常常是把版本、目录、校勘、辨伪的工作一起来进行的。

我国古书的历史，最初写在竹木简上，后来写在帛上，再后写在纸上，唐代才有雕版印刷。在长时期的传

抄中，错字、错句、错简、重复、脱落、添加等种种错误极多。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中秘（即皇家图书馆），主要是搞校勘工作，当时叫做校雠。此后流传下来的书，绝大部分是他们校过的。自有刻本之后，错误减少很多，但有的书由于校勘不精，错字错句仍不少。另外，封建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常常对古籍中不利于他们统治的内容加以删削、篡改。例如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就曾下令，对明人所刻书中所有违碍字样一律删削，或改变字句，于是原书面目就改观了。所以古人读书很注重找好版本或专家校对过的版本。如《史记》，南宋黄善夫本，明代震泽王氏的刻本是比较好的，清末张文虎又作了校正。中华书局印的标点本《史记》，就是以张本为底本的。

校勘在古代很早就开始了。《吕氏春秋·察传篇》讲，子夏过卫，有人读卫史“晋师三豕涉河”，不懂，问子夏。子夏说：“三豕”是错字，应该是“己亥”。古时以干支记日，己亥是晋师过河的日子。“亥”字的古文与“豕”字形体差不多，亥被写成豕，是形近而讹。“己”字为什么错成“三”呢？容庚编的《殷墟卜辞》中有一条：“壬辰卜，大贞，翌己亥……”，其中“己”字正作“三”。甲骨刻辞多先刻横画，后刻竖画，此条忘刻了竖画，“己”就成了“三”。大概卫人所见的史书，是刻在竹木简上的，所以和甲骨文发生相同的错误。

又如《尚书·金縢篇》有“予仁若考能”一句，这里的“仁”字很有问题。因为“仁”字这个概念在周初恐怕还未产生；到春秋时期，特别是经过孔子的宣扬，才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学说。《史记》引这句话作“旦巧能”，没有“仁”字。可见此篇中的“仁”字是多余的

字。“考”字《鲁世家》作“巧”，二字古通。“予若考能”同于“旦巧能”。《史记》的记载可以订正《金滕》的抄写之误。

《汉书·刘歆传》说：“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这段话肯定有错误。《史记·孔子世家》说：“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孔安国死得很早，不会在汉武帝晚年的天汉年间还活着。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在荀悦的《汉纪》里发现此段记事，在“孔安国”后有一“家”字，问题才搞清楚。不是“孔安国献之”，而是孔安国的后人献之。一字之差，关系重大，于此可见校勘的重要性。

古书中类似的脱文、衍文、错讹、倒置现象非常之多。如贾谊《新书》“故陈胜一动而天下振”一句，有的刻本作“天下不振”，多一“不”字，与原义完全相反。又如，许慎《说文解字叙》：“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这段话中，“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十二字应移“秦隶书”之下。因为史书记载小篆是李斯作的，隶书是程邈作的，把这十二字放在小篆之下，显然是错简。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研究历史必须具备校勘学的基本知识，这样我们所依据的史料，才真实可靠。

校勘也不一定都用于古代书籍，无论古今，错字是

会经常在书上碰到的，我们看书时要有警惕性，不要认为凡是书上印的就一定是对的。在新印的古书里，这种问题同样很多，这就要求我们能够辨别，善于看出印书的错误，并设法找到旧的版本去对照更正，我们读书时对这种事要细心，稍一马虎便会出错。举一个例子，陈援庵先生在《跋西凉户籍残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一文里讲到敦煌出土文书中有西凉（东晋时李嵩所建国）户籍残卷，记一人名“德，年廿一，驿子”。今中华书局所印《敦煌资料》，“驿子”误为“释子”。陈先生说：“驿子”见《北齐书》卷一《神武记》：“梗阳驿子，愿厕左右，访之，则以力闻。”据此，驿子即驿卒，是担任驿站差役的士卒，故以力闻。今误作释子，则变成和尚了。当然，象这样的校勘，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不能用这样高标准要求初学，这里只是说明，在新印的书里，校勘的事也是不可忽略的。

关于校勘的方法，陈先生在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中归纳为四种，这里简单地讲一下：

（1）对校：用一种年代更早或更好的版本和要校的本子两相对照，不管对与不对，把不同之处都记在要校的本子上。这是最基本的校勘方法，名为对校。

（2）本校：没有更好的本子，而就本书中不一致之处前后相校，发现问题，名为本校。

（3）它校：没有不同版本，或虽有不同版本但解决不了问题，只好用其他书来校。如上文提到的用《史记》校《尚书·金縢》的“予仁若考能”的“仁”字是衍文。《汉书·刘歆传》中“孔安国家献之”这句话中掉了个“家”字，无论什么版本的《汉书》都没有这个字，阎若璩使用荀悦的《汉纪》来校正，补上这个“家”字，

就是它校。

（4）理校：上述几种条件都不具备，而又解释不通，只好从文理上去考虑是否有错误，这叫理校。理校不能轻易用，很容易弄错。但是，学问广博而又细心、对古籍真有研究的专家，往往用这种方法取得很好的成绩。举一个例：北宋时编的《文苑英华》，是续《昭明文选》的，共一千卷。有个叫彭叔夏的作了一本《文苑英华辨正》，专门考证、校勘《文苑英华》中的错误。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引了《太祖皇帝实录》中的一句话：“兴衰治之源。”彭认为句中缺的一定是个“乱”字，但他未敢贸然添上。后来又遇到个好的本子，才知道缺的是个“忽”字（“在治忽”，见于《尚书·益稷篇》）。“忽”与“乱”意思相近而程度比“乱”稍差。由此可见，理校不可轻改古书。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一生校过不少书，在遇到他认为是错字的，就注上“某，当作某”而不改原字，说明古人校书是非常慎重的。现在印书，有的轻于改字，是不好的风气。此风盛于明朝，清朝人有这样一句讽刺的话：“明人刻书而书亡。”这虽然是夸张之辞，但它说明使人看不清原书面貌是明人刻书的毛病。这个毛病现在还有，所以，我们今天在重印古书的时候，应该注意，没有确凿的证据决不要轻易改字。就是有证据也最好不改原字，而用郑玄的办法做个小注就行了。至于成语、典故之类一望而知其误的，当然可以改，情况不同，自当别论。

年代学年代也是历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历史事件没有年代，就弄不清事件发生的先后，就无法了解它和其他事件的联系。古人很重视纪年，但由

于历代历法变更，纪年方法改变，干支前后重复，加以年代久远，记载讹误缺略，给后人的研究带来很多困难。唯其如此，我们才应当对年代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中国历史有可靠记载的纪年，是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 841 年开始的。我国第一部记传体史书《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即始于此年。现在我们看史书，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个朝代的年代，大都是史家推算出来的，各家说法并不一致，尚无定论。不过，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学者依据天文历法、地下出土材料与历史文献相印证，推算会越来越趋于准确。

中国历史纪年有如下特点：

一，从西周共和元年到汉武帝建元元年之前，一般是以王公即位的年次纪年，有年数而无年号，如：周宣王元年、鲁襄公四年之类。一般每一王公即位就改换一次纪元，只有个别中途改元。金文则只有“唯王×祀”或“唯王××年”，并无某王的谥。这样就给古代史的年代学带来很大的困难。现在人们写年表，用公元相参照，就方便多了。今本《十二诸侯年表》于共和元年上书“庚申”，乃东晋人徐广所增。古人以干支纪日，没有用干支纪年的。干支纪年始于后汉章帝改历时，钱大昕曾论及，有人说干支纪年始于共和元年庚申，那是大错。

二，古代帝王无年号，汉武帝建元元年开始使用年号，一般每个帝王即位的次年即改用一个新的年号，许多帝王在位时也常常因故改元，改元即改用新年号。如汉武帝刘彻在位 45 年改了 11 个年号；唐高宗在位 35 年，用了 14 个年号；武则天在位 21 年，用了 17 个年号。